



章 乃 器

一生何求



汪一凡 / 文

他曾是沪上有名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
挑起「借贷」与「收付」之争
他曾是香港最成功的实业家之一
自言「资本主义经营达到最高峰」
他曾是旧中国的财政厅长和新中国的粮食部长
从「为资本家打算盘」转而「为人民打算盘」

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中国近代史上特立独行的爱国民主先驱。他少年时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后长期服务于银行界和工商界,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先知先觉型的代表人物。

章乃器的一生,经历了为学、为商、为官三种不同的路径,诠释着一名知识分子为己和为公的人生命题。

为学

说起章乃器对于会计界的贡献,要从“借贷”与“收付”之争谈起。

会计是章乃器的老本行,他不仅是立信会计学校的校董,还曾“主持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多年,百忙之中仍能不废所学”(《立信会计季刊》)。

1950年,章乃器在上海《大公报》接连发表《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和《再论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两文,引发关于收付法与借贷法的大讨论,使当时的会计界“朝野”震动,其建议也为政府所采纳,在近现代会计史上产生深远影响。

《大信会计月刊》主编吴英豪曾撰文说:“借贷与收付问题之争,自从去年二月间章乃器先生的《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一文倡导收付记账法以来,会计学者之间,一直就在争辩着……由于‘收付’两字在中国人的传统上较之‘借贷’两字在计算的实用上来得普遍,同时章先生与徐永祚先生都认为中国的收付记账法也颇合应用,这有如章先生说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来记账是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所以一年来人民银行的会计制度及财政部所颁发人民政府的总会计制度及单位会计制度,都不用借贷而用收付了。”

而《新会计》发刊词则明述到:“自从章乃器先生发表《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一篇文章,提倡民族的、大众的现金收付记账法以后,竟成了一个重要的会计问题。政府领导同志和全国会计工作者对此重要会计问题意见颇不一致,据闻先后有一百多个文件送给各报馆去刊登,报纸因为篇幅有限,没有发表,都把它转送章先生参考。这一百多个文件,来自各地区各阶



浙江工商大学矗立的章乃器头像。

层,无论赞成或反对方面,都该是探讨真理的文章。我们将来或商请章先生择优发表一部分。还有中央财政会计制度处几位同志,想调和两种不同的记账方法,曾经作过一个试探,新创一种付列左收方列右的记账方法,亦还没有得到一致的拥护。关于这一问题,我们认为还有从长讨论的必要。”

著名会计学家、民国时期曾任岁计局长的杨汝梅明

确表达了对收付记账法的支持:“过去对于记账方法,有现金收付记账法和借贷记账法的两种争论,其实‘收付’二字,和‘借贷’二字,都是一种记账符号,并不含有什么奥妙的会计技术,争论实无多大意义。惟‘收付’二字,通俗易懂,最适合于吾人的现实生活,

用之于政府会计,尤为合宜。政府会计的本质,就是收支会计。中央财政会计部最近颁行的各级政府总会计制度及单位会计制度,均称为预算会计制度,以预算所列的收入、支出,为其计算对象。在收入类的会计科目,已将收入字义,明白表示出来。”

夏高波先生则将两种记账方法称为“盟友”,写出一篇豪迈的战斗檄文:“无可否认的,收付簿记是清算旧式簿记的战士!而且它站在最前线,因为清算了简陋的旧式簿记,这个空隙,在发展规律上,在各种条件



直节虚怀,这四个字是对章乃器最恰当的评价。

上,收付簿记往往先声夺人,很顺利地先到达目的地,解放它,接收它。借贷簿记在后面支援,有困难便可向借贷簿记商酌,使收付簿记在原有的胜利成果上,再巩固起来,再提高一步!所以它们是盟友!”

当然也有不赞同的意见,如张道传和朱家珍两位先生在《讨论章乃器先生的收付记账法》中谈到:“在外国文字中,也有收付,外国人民也是从货币收付关系中长大的,而同样还继续浸润在这个关系中,收付对于他们,和对于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借’‘贷’不合我们国情,同样地也必不合他们国情。但他们自复式簿记通行之后,在账务的处理上,就不用收付而用借贷,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呢?难道我们人民都是那样无能,对于借贷就特别感到困难而不能学么?事实证明并不如此,借贷是容易学容易懂的,我们黄色人种的智慧,并没有低于白色人种。我们无丝毫理由要自卑自薄。”

章乃器的为学,影响并不局限在会计界。

1918年,从浙江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后,章乃器开始在银行当练习生,工余潜心研究经济学和金融学,所著的《中国货币金融问题》被译为英文和日文,成为受国际学术界重视的权威性著作,而他本人也从练习生开始,升任至银行襄理兼营业主任。作为沪上有名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章乃器还常到光华大学、沪江大学和上海商学院等讲授课程,将自己的所学所思传授给学子们。

为商与为官

由于进行政治活动,章乃器的学术研究在很长时期里停滞下来,他把目光转向了更广阔的领域。

1923年,章乃器成立中国征信所,对银行客户的信用进行调查,与外资竞争,非常成功。

1937年7月31日,章乃器与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一同发表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与红军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却遭到南京国民政府逮捕,史称“七君子事件”。一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章才获释。

此后,他在大后方与人合资创办实业公司,有酒精厂、手摇发电机厂等。战时物质缺乏,酒精是替代汽油的重要战略采购物质,章的公司获利甚丰,他却因拒绝向军政部行贿而与投资方产生了冲突。

在安徽当财政厅长时,章乃器主张团结抗战,不



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君子”等人,自右至左依次为:李公朴、王造时、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沙千里、杜重远。

但以每月3万银元的财政拨款支援新四军,给他们送去急需的金鸡纳霜等药品,还为共产党培训了大批财经干部。他的战时财政搞得很好,蒋介石想让他当财政部长,以整顿不景气的大后方经济,章因为不认同蒋的政权而谢绝,蒋介石又动员陈诚、孔祥熙、陈立夫等劝说,也未奏效。蒋遗憾地说:“我是想用章乃器,章乃器不为我所用。”

1948年,章乃器在香港创办港九地产公司,在香港最贵的地段做房地产,获利甚多,自言“资本主义经营达到最高峰”。就在此时,新中国成立了,章乃器接到中共中央电召,当即放弃了在香港大有可为的事业和优裕的生活,与李济深、茅盾、马寅初等三十余位民主人士秘密北上,返回大陆。他在欢迎会上说:“我过去多年为资本家打算盘,今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打算盘。”此后,他参与了政协的筹备工作,并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52年8月,章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长,协助陈云制定粮食统购统销的重要政策,推出发放粮票等举措,使粮食问题得以稳定。甚至在被打为“右派”罢免职务后,他还一边练气功,一边鉴赏文物和读书。由于独具慧眼,他先后向国家文物局捐献近两千件的文物。这样的心胸,实在值得今人敬仰。

1977年,章乃器先生以80高龄去世,而他的一生,也成为永远的传奇。

(作者供职于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